

周伐玁狁与“长父侯于杨”相关问题

李建生 王金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1)

Abstract: The Duoyou Ding tripod and the 42nd year Lai Ding tripod recorded two wars between the Western Zhou tribe and Xianyun, where did the two wars happen? The two tripods recorded *ZhangFu was conferred marquis in Yang*, where was Yang state? There was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er Yang state destroyed and the later Yang state created. What was the identity of Yangjie, was she the wife of Bangfu marquis of Jin or the marquis of Yang.

Key words: Yang state; Shangfu; Yangjie

摘要: 多友鼎、四十二年逯鼎记述了西周与玁狁(或戎)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发生在何地?“长父侯于杨”,杨又在何地?前杨国之灭与后杨国肇建是有因果关系的。“杨姑”究竟是晋侯邦父的夫人,还是杨侯的夫人?

关键词: 杨国; 尚父; 杨姑

古代,人名、地名相同者甚多。周伐玁狁(戎)战事发生在何地?四十二年逯鼎记述“长父侯于杨”,杨国究竟在何地?多友鼎记述的“杨冢”又在何地?学界有不同观点。彭裕商先生推测,陕西多名杨之地,“杨”、“杨冢”当在陕西,而不是山西的杨国^[1]。田率先生也持相同观点^[2]。

有学者认为四十二年逯鼎,“所涉地名有邢阿、历岩、弓谷等地,对玁狁作战的人除逯而外,主帅似为长父。铭中记长父的封地在杨,此杨当在陕西,推测是一个小地名,而不是山西的杨国。眉县杨家村已发现三批单氏家族的铜器,其地当为单氏家族世居之处,故逯到山西去作战的可能性很小。陕西本有名杨之地,如多友鼎有杨冢,发现逯器之地为杨家村等,如此,则邢阿等地也当在陕西求之,如杨与多友鼎的杨冢有关系,则诸地当在京师附近。”^[3]

又有学者认为“长父受封之杨所在的地望到底为何处,四十二年逯鼎中的杨国是否就是古籍中记载的杨国,还有待商榷”;“可见宣王时期在今山西中南部地区的杨国不是姬姓国家,而

是姞姓诸侯,与四十二年逯鼎中的长父所封之杨并非一处。……逯奉命辅佐长父立国建军,故长父所封之杨地,也就在此批窖藏的出土地不远,正如彭裕商先生所推测的陕西多名杨之地,如杨家村有可能就是杨国故地。”^[4]

作为地名,“杨”、“杨冢”见于四十二年逯鼎和多友鼎。上述二鼎记述了两次周伐玁狁的战争。而两次战事究竟发生在何地?宣王为什么要二次封杨?前杨国又为谁所灭?因此,两次讨伐玁狁战事所在地域与“长父封杨”之杨在何地至关重要。

多友鼎:“……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筍,衣(卒)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辰,搏于(穫),多友右(有)折首执讯,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卒)复筍人俘;或(又)搏于龚,折首卅又六人,执讯二人,俘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多友或(又)右(有)折首执讯;乃弑追于杨冢,公车折首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三人。”

“京师”,有学者谓即镐京。其实古人所谓“京师”不是特指一个固定的地方。

《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胥斯原。”

又曰“涉则在岫，复降在原。”又曰“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冈，乃遘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笃公刘于京斯依。”可见“京”与“原”相同。绛有故绛、新绛，这里讲的“复降”当指新绛（晋新田）。公刘居邠，邠距汾域之荀不远。邠同豳，公刘亦称豳公也。

《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孔颖达疏：“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风俗通义·山泽第十》：“京，谓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国语·晋语八》：“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韦注“‘原’当作‘京’也。”《方輿纪要》：“鼓堆泉出九原山，其山有堆如覆釜形，水分二派，东曰清泉，西曰灰泉，以注于汾水，《水经注》谓之古水，其堆亦曰古堆。”《新绛县志》：“鼓水（泉水）又名鼓堆泉，为本县最大的涌水泉，发源于九原山下。据旧志记载，因‘泉北突有二山，高圆如鼓，则泉以形似而名’。”然，九个鼓堆形的山即九原山，位于今新绛县境内清风庄一带。

“荀”，同荀、郇。《水经注·汾水注》：“古水出临汾西，又西南径荀城，在绛州西十五里。”《左传》桓公九年云“秋，虢仲（三门峡）、芮伯（韩城）、梁伯（韩城）、荀侯（今新绛县）、贾伯（襄汾）伐曲沃（闻喜）。”由此知五国相距不远。

《汉书·地理志》注引《汲郡古文》：“晋武公元年（公元前678年）灭荀以赐大夫原黯，是为荀叔。”《水经·涑水注》：“涑水经猗氏故城北，又西径郇域，郇伯国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述了秦军送重耳回晋国，晋兵拒之，经斡旋，晋“师退，军于郇”，“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春秋中期此郇为晋地，在今临猗县西境。

汾水之荀与涑水之荀两地自别，犹如故绛、新绛。多友鼎铭之“荀”为西周时期汾水之荀，此荀国在今新绛县境内。东周之郇在今临猗县西境。

1974年山西省考古所在闻喜县上郭村（古曲沃）M55出土青铜匜有铭文“荀侯稽（？）作宝匜其万寿子孙永宝用。”^[5]此匜所属时代与多友鼎相同，因此，多友鼎铭所指“荀”与M55出土匜铭“荀侯”当指同一荀国。

穫（霍），此字原形右从“邑”旁，左半声

旁是由从“禾”、从“弋”会意的古文字“穫”字形体省略而来，因此可读为“霍”^[6]。“霍”乃晋国拒戎狄之北部天然屏障。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其六曰霍叔处。”《索隐》地理志河东彘县（今霍县附近），霍太山在东北，是霍叔之所封地。传世铜器有霍壶、霍作已公鼎。《国语·晋语一》：“（献公）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太子遂行，克霍而还。”《史记·赵世家》：“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地名考略·霍》：“至霍哀公，为晋所灭，哀公奔齐，晋以其地赐大夫先且居。”

《国语·晋语二》：“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尔雅·释山》：“大山，宫；小山，霍。”宫，围；屏障。霍，大山围绕小山之称。《山海经》：“景山南望盐贩之泽。”

西周时期晋国疆域，南不过绛山，北至贾（襄汾），杨（洪洞）、霍（霍县）位于贾（襄汾）之北。从晋国去霍国，路途必经贾、杨。因此，《国语》所指“景、霍以为城”，显然不是指霍国。

龚，在荀国附近。

世，在荀、杨之间。

“杨冢”，《诗·小雅·十月》有“山冢嵬崩”。“冢”，可理解为山顶。从考古发掘资料看，西周时期墓葬是不起冢的。“杨冢”当为地名，在杨国附近山区，离洪洞永凝堡——坊堆不会太远。

多友鼎记载周伐玁狁战事所在地域，在今新绛县—洪洞县一两日路程。

四十二年逯鼎长父封杨与周伐玁狁铭文摘录如下：

“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命）女（汝）奠长父，休，女（汝）克奠于厥师。女（汝）佳（唯）克井（型）乃先且（祖）考，鬲玁狁，出捷于井阿、于历岩；女（汝）不畏戎，女（汝）□长父，以追搏戎，乃即宕伐于弓谷，女（汝）执讯获贄，俘器、车马。”

四十二年逯鼎有关地名“杨”、“井阿”、“历岩”、“弓谷”。

“井”，与“陞”古音相近，可以通假，可以理解不同时期文献用字不同。《左传·桓公二年》：“（晋）哀侯侵陞庭之田。陞庭，南鄙，启

曲沃伐翼。”《史记·晋世家》：“（晋）哀侯八年，晋侵陜庭，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虜哀侯。”《史记正义》：“按陜庭故城绛州曲沃县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阳。”

“历岩”、“弓谷”与描写山区地势、地貌有关系。应该在今洪洞（杨国）周围的山区来寻找，于杨国也不会太远。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卢柳。秦伯使公子挚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

卢柳，据《方輿纪要》临猗县北有庐柳城。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四“庐柳”今猗氏县西北有庐柳城。1954年由临晋、猗氏两县合并成临猗县。

郇，《水经·涑水注》：“涑水经猗氏故城北，又西径郇域，郇伯国也。”春秋之郇在今临猗县西境。

曲沃，《史记·晋世家》：“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武公兼灭翼嫡成为晋侯，曲沃庶系由小宗变为大宗。

晋武公始建宗庙，《左传》称之武宫。自晋武公始，献公、襄公、文公等，晋国重大事件的祭奠均在曲沃武宫进行。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文公死在都城绛，殡于曲沃武宫宗庙，归葬之地估计离曲沃不会太远。

闻喜县上郭墓地远及邱家庄一带，南北10公里，东西1公里，时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上郭村北的一所学校内钻探出一段城墙，时代和走向均无详细材料发表。但在闻喜上郭村墓葬出土带有国别的青铜器“荀侯匜”、“贮（贾）子已父匜”、“重（董）五氏矩”甗等^[7]。1990年以后在上郭村附近盗掘出“子犯钟”。我们认为“荀”、“贾”、“董”有国别的礼器出土于闻喜上郭村墓地，可能是晋灭其邻近之国所获。“子犯钟”的出土进一步确定《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闻喜，故曲沃”。

高梁，《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杨有高梁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使杀怀公于高梁”。杜预曰“在县西南。”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有

杨城。晋灭之，以为羊舍氏封邑。”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叔向封邑在此地，以邑名为氏，曰“杨食我”。高梁古城墙至今还存在。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考古所在高梁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文化遗存属春秋时期，与晋国大夫叔向所处时代一致。读《汉书·地理志》可知，洪洞在汉代称为杨县。陶正刚先生认为，洪洞县东南十八里，霍山南面的范村、安东村、张村、敬村之间，就是晋灭杨之后的羊舌古城^[8]。

《左传·桓公二年》：“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杜预注“条，晋地。仇，太子文侯也。意取于战败仇怨。”宣王伐条戎、玁狁，而晋师常从，则条戎、玁狁亦近晋。高士奇《春秋名地》以条戎为安邑中条山之北之鸣条陌。《史记·晋世家》穆侯七年伐条，十年伐千亩，两次伐戎皆在今山西之南部。

玁狁，《左传》称“允姓之姦”。其实，玁狁不一定都活动于陕甘一带。在晋南地区对周人构成威胁的多为玁狁或戎。《左传·宣公四年》分唐叔“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怀姓九宗”是晋国当地原住民。怀姓，有可能是媿姓。“怀姓九宗”当是媿姓九个分支的族群，是晋国居民主要构成部分。《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国语·晋语二》：“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玁狁是游牧民族，是要迁徙的，不会固定在一个地域，不必凡见戎、玁狁，必引陕甘之为说。其实，晋南地区，对诸侯封国构成的威胁主要来自玁狁或戎。

二

1980年发掘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9]，早期M11、M12；中期M1、M2、M3、M4；晚期M7、M8、M9，十几座墓均为南北向。其中M7是一座中型墓，有鼎、簋、壶、匜、盘等，与北赵晋侯墓地M93、M102出土同类器一致，属两周之际幽王一平王前期的墓葬。

20世纪90年代中期，永凝堡墓地被盗（村东，公路北侧）。1995年5月，洪洞县博物馆业务人员对被盗墓葬作善后发掘处理。8座墓为土坑竖穴，墓葬均为南北向。M1、M2为大型墓，

其余为小型墓。

M2, 为大型墓, 深 8 米。该墓出土青铜簋, 高 23.5 厘米, 口径 20 厘米。盖内、簋内底有铭文竖款二行 13 个字, “□尚父作宝簋其万年子孙永用”。第一个字不认识, 可能是私名。

1995 年洪洞永凝堡 M2 出土“尚父”簋, 2003 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四十二年逯鼎又有“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一句, 尚父簋与四十二年逯鼎时代相同, 所属年代均为宣王晚年。

尚, 禅母阳部; 长, 端母阳部, 禅端旁转, 长、尚音近相通。“长父”与“尚父”当是同一个杨侯。由此印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杨氏出于姬姓, 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

洪洞坊堆—永凝堡多为西周早、中期的遗址、墓葬^[10], 可以考虑是早期杨国的遗存, 与前杨国兼容。但是, 先杨国(尚父封杨以前的杨国), 不一定就是姬姓。“杨姑”壶制作年代属宣王四十二年“长父侯于杨”之后。

1980 年洪洞永凝堡发现的 M7、M8、M9 三座墓葬其时代属两周之际^[11], 与 1995 年永凝堡 M2 出土重要文物“尚父”簋同属二次封杨后的文化遗存。

永凝堡墓地, 有西周早期、中期、晚期(两周之际)的墓葬, 墓地具有连续性, 前杨国之灭与后杨国的建立, 其间隔时间不会太长。

三

晋侯墓地 M63 出土杨姑壶一对, 有铭文“杨姑乍羞醴壶永宝用”^[12], 属杨国有铭文铜器首次发现。关于“杨姑”二字释读已发表了多篇论文, 并形成了对于作器者“杨姑”身份截然不同的观点, 学界对“杨姑”有二种解释:

一、杨姑是杨国之女, 由此, 判定此杨国为姬姓国^{[13][14]}。

a. “杨姑”是杨国之女, 壶出自晋侯夫人墓中, 有可能是姬姓杨国嫁女与晋时的媵器, 该墓的墓主人可能就是“杨姑”。

b. “杨姑”是杨国之女嫁与晋侯之后自称, 即晋侯夫人自称“杨姑”。

二、壶的行文格式证明是女子嫁于杨国后的自称, 姑为女子母国国姓, 杨为夫国国名^[15]。

a. 女子不可能自己给自己作媵器。把“杨姑”解释为“是当时杨国随嫁其女的媵器”, 媵器铭文的主语应当是所嫁女子的父母, 不应当是

女子本人^[16]。

b. 杨姑壶的铸造年代为尚父封杨之后, 因此, “杨姑”是不能判定前杨国为姬姓的。晋侯墓地 M63 墓主晋侯夫人不是杨姑, 杨姑是杨侯的夫人^[17]。

2006 年吉琨璋先生在四十二年逯鼎“余肇建长父侯于杨”发表之后, 在论证邰国墓地 M1 墓主毕姬, 以多数学者的观点为依据“在晋侯墓地晋穆侯次夫人墓中, 出土杨姑壶。学者们多认为杨姑是杨国的女子, 而杨国是姬姓。以此类推。”^[18]

2010 年田率、张天恩先生又著文立说, 赞同第一种观点:

“天马一曲村晋侯 63 号墓地出土过一件杨姑壶, 是当时杨侯随嫁其女的媵器。晋侯墓地的主人是晋穆侯邦父, 晋穆侯在位的时期是周宣王十七年(公元前 811 年)至四十三年(公元前 785 年), 这一时期的杨国与晋国通婚, 为姬姓诸侯。”^[19]

“但永凝堡等地发现有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 与《新唐书》、逯鼎所记却无法兼容, 故在尚父封杨以前曾有一姬姓之杨国不是没有可能。依《晋世家》记载, 宣王四十二年为晋穆侯逝世的前一年, 夫人来自早先之姬姓杨国也无不通。此杨可能就是在晋始封时所建或更早的姬姓之国, 也是杨姑的母国。”^[20]

下面我们分析第一种观点:

a. 杨姑壶为姬姓杨国嫁女与晋时的媵器。

读《韩非子·外储说·下》(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 妇人十五而嫁。”先秦婚俗嫁女时以侄娣和财物随嫁, 称之为媵。媵器当由父母所作。西周时期青铜礼器为国家严格控制, 一个十几岁的女子为嫁夫君, 不可能自己给自己作媵器。

作器者“杨姑”是壶的主人, 是第一人称。杨姑作为本国女子, 不能自己给自己作媵器, 媵器由父母所作。作器者应当是所嫁女子的父母, 而不是所嫁女子本人。把“杨姑”解释为“是当时杨国随嫁其女的媵器”, 媵器铭文的主语应当是所嫁女子的父母, 不应当是女子本人。

b. 已婚女子自作器的铭文中, 在女子本国国姓前可以冠夫国的国名, 也可以冠女子本国国名。把“杨姑”理解为杨国之女嫁与晋侯之后自称, 即: 晋侯夫人自称“杨姑”。如“鲁姬

乍尊鬲永宝用”(《三代吉金文存》5.518.2),“齐姜作宝尊鼎”(《集成》2148)。若,杨国能够确定为姁姓国,此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鲁国姬姓,齐国姜姓是可以确认的,而杨国则不然。一般来讲,作器者为未婚女子,女子未嫁,当然无子女,无需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词句。反之,已嫁女子铭文当有类似“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词句。而“鲁姬”、“齐姜”之铭则没有子孙永宝用一词。因此,“鲁姬”、“齐姜”属已嫁女子还是未嫁女子还难以确认。四十二年速鼎有:“余肇建长父侯于杨”,宣王四十二年当属二次封杨,后杨国姬姓确信无疑。而杨姑壶的制作年代属二次封杨之后,杨姑壶不能判定前杨国为姁姓。

我在《“梁姬”、“杨姑”相关问题》^[21]一文指出,讨论杨姑壶的铭文,首先要认定杨姑壶制作年代。该壶的制造年代在宣王四十二年以前?还是之后?我们说两件杨姑壶表现出宣王晚年一幽王的特征,开始出现平王初年特征。与虢国太子墓 M2011:62、251 非常相似。姬姓杨国(二次封杨)始于宣王四十二年,即晋穆侯二十六年。杨姑壶的铸造年代为尚父封杨之后,因此,“杨姑”是不能判定前杨国为姁姓的。西周时期,同姓不婚。“杨姑”作为壶的主人,只能证明姁姓国家的女子嫁与姬姓杨国,“杨姑”是杨侯的夫人,晋侯墓地 M63 晋侯邦父夫人不是杨姑。

虢国墓地虢季夫人墓(M2012)出土的梁姬罐,盖内铸二行五字,铭文反书,自右至左竖款排为“梁姬乍□□”。后二字为贮存器名^[22]。作器者“梁姬”与“杨姑”一样,均为第一人称,是铭文的主语。

《左传》僖公十七年“夏,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左传》称梁伯之女为“梁嬴”。梁国为嬴姓,与姬姓晋国通婚。梁伯之女嫁与晋惠公,生太子圉,立为晋怀公。

嬴姓梁国,建于平王之初年,因为秦襄公与小叔嬴康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平王封嬴康于梁山之阳。梁国的赠贖之物出土在虢季夫人墓中,M2012 虢季夫人的下葬年代^[23],笔者认为已进入了平王纪年。

虢季夫人墓出土有铭文“梁姬”的自作器,通常被认为墓主虢季夫人就是“梁姬”。学界简

单地认为“梁姬”为梁国的女子,国姓前冠女子本国国名。正如姜涛先生指出“姬姓梁国之女嫁与姬姓虢国国君虢季为妻,是为同姓通婚。”^[24]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晋侯墓地 M63 “晋侯邦父”夫人墓出土有“杨姑”铭文的自作器,就认为“杨姑是杨国之女,壶出自晋侯夫人墓中,有可能是姁姓杨国嫁女与晋时的媵器,该墓的墓主人可能就是杨姑”^[25]。甚至有的学者怀疑《左传》、《史记》、《世本》记载梁国(嬴姓)、杨国(姬姓)的可靠性。

持有“杨姑”壶、“梁姬”罐为本国之女,嫁与夫国所作媵器观点的先生们,忽视了媵器铭文的主语应当是所嫁女子的父母,不应当是女子本人。

结 语

古代地名、人名相同者甚多,周伐玁狁(戎)战事所属的地域,学界有不同认定,是正常的。四十二年速鼎有“长父侯于杨”;多友鼎有“杨冢”,二鼎所指当属同一地域。而“杨”、“杨冢”作为地名只能从出土的考古文物中得到确认,“地理志在考古学中只能作旁证”。

据多友鼎铭,多友在甲申之晨与戎“搏于穫(霍)”,接着“又搏于龚(绛)”,然后“追搏于世”,然后又“弑追至于杨冢”。多友与玁狁战于荀、穫(霍,晋之屏障)、龚(绛)、世、杨冢,五地距“京师”(今新绛县)的距离当在一日路程。因此“京师”显然不是周王朝之镐京,更不是扶风豳地。

四十二年速鼎有地名“杨”,而多友鼎又有铭“杨冢”,二鼎铭均记述周伐玁狁的战事,因此,“杨”、“杨冢”所属地域至关重要。从多友鼎铭理解征伐玁狁的战事在一两日内结束,因此,两次周伐玁狁(戎)战事所属地域不会太大。只有确定“杨”、“杨冢”的地理位置,其他地名则不会离“杨”、“杨冢”太远。就是说多友鼎“荀”(荀、“穫”(霍、“龚”(绛、“世”;四十二年速鼎铭“井阿”、“历岩”、“弓谷”所涉地名当在“杨”、“杨冢”周围一两日路程去找。

《左传·桓公二年》:“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就是说晋国和其他诸侯国要经常

参加周伐玁狁（戎）的战争，而这些战争所在的地域，离晋国不会太远，当在山西的南部。

西周王室有六师，《诗·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一师有二千五百人，见《周礼·地官·小司徒》。西周金文有西六师和殷八师，见《小克鼎》，《禹鼎》。由此知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并不多。

杨宽《西周史》：“史密簋载：由于卢、虎、杞夷等南夷的‘广伐东国’，天子派遣师俗和史密东征，东征的大军，不是王朝的西六师或成周八师，而是就近从齐国调发的齐师，齐的遂人以及釐（菜）白（伯）和樊族等少数裔族。”

多友鼎铭文反映王命武公讨伐玁狁的战事，周王钦命武公、多友为这次战争的最高指挥。除一部军队为周王室所有，大多数兵员是由诸侯各国组成的联军，诸侯各国的军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集结，这个地方就是“京师”。

宣王时期征伐玁狁或戎所用兵数量并不多，古本《竹书纪年》记有“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周伐玁狁（戎）所需军队，不可能千里跋涉到异地作战，多数兵源由当地诸侯国提供，各路诸侯的军队必须有一个组织者和身份很高的统帅。逯作为长父的副手，多友为武公的副手，他们是周王的钦差，到晋南组织、指挥诸侯各国军队征伐玁狁。

多友鼎、四十二年逯鼎，所记述的周伐玁狁的两次战争，当在晋南地区。眉县杨家村发现三批单氏家族的铜器，当为单氏家族世居之处。“逯”作为单氏家族一员，宣王的钦差，辅佐长父（尚父）到晋南组织、指挥征伐玁狁的战事未尝不可。

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逯盘共有327字，详细记载单氏家族八代人的生平事迹，其中有惠仲盨父（供职于穆王时期）。惠，字。仲，行属。盨，名。名后加缀父。上世纪50年代眉县李家村窖藏出土过一组铜器，从盨方彝、盨驹尊铭文看，“盨”当为器主之名。姬姓高级贵族有字、名连称的习惯。

1995年洪洞永凝堡M2出土“尚父”簋，“□尚父作宝簋其万年子孙永用”。第一个字不认识，可能是私名，“□尚父”当为名与字连称。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有“虞、虢、

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

《汉书·杨雄传》有文王之庶子伯侨封杨的记载“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於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杨侯。”

宣王四十二年逯鼎“余肇建长父侯于杨”，多友鼎有“杨冢”。

文王之庶子伯侨始封于汾隅之杨，宣王之庶子尚父二次封杨。成王、宣王的两次封杨国均为姬姓。

周代，同名同字甚多。“尚父”簋是否存在重名重字现象。《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尚”是宣王为其非嫡出小儿子所冠之字，“父”则是贵族成年男子美称。“尚父”为杨国国君，至少在杨国贵族阶层与国君“尚父”同名同字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关键是在洪洞永凝堡杨国的墓地出土了“尚父”簋，此簋的主人为宣王子“尚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国君不称氏，称国。例如“晋侯邦父”、“荀侯稽”、“虞侯政”、“贮（贾）子已父”。“尚父”簋的制作年代与“尚父”所处年代一致，属宣王晚期。考虑到“尚父”簋没有冠其国名，可能是“长（尚）父侯与杨”之前铸造的。

新出的四十二年逯鼎铭文中“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一句，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杨氏出于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相互印证。洪洞永凝堡杨国墓地又出土了“尚父”簋，“长父侯于杨”之杨国在晋南洪洞县确信无疑。

山西洪洞县汉代称之杨县，东周属杨邑，晋灭杨国后，晋国公族大夫叔向食邑在杨，以杨为氏，其子又曰“杨食我”。洪洞，西周属姬姓杨国。“杨”作为国名、邑名、县名传承清晰。眉县杨家村既没有杨国古代文化遗存，又没有古文献的佐证。长父（尚父）封杨，此杨国不在陕西，与眉县杨家村也没关系。

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的杨姑壶是赠物，即建国不久的杨侯夫人为晋侯夫人送葬之物。“杨姑”为姑姓女子嫁于姬姓杨国国君后的自称。晋侯墓地M63墓主，晋侯邦父的夫人不是杨姑。

虢季夫人墓出土的梁姬罐也是赠物，即建国不久的嬴姓梁国及其夫人为虢季夫人所送赠物。梁姬不是虢季夫人，她不是墓主，梁姬

是梁伯的夫人。

晋侯夫人、虢季夫人墓，始建不久与之相邻的杨国、梁国及其夫人为之送葬。杨姑壶、梁姬罐是诸侯国之间，夫人与夫人的礼尚往来赠贖之物。

两周之际，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大国兴起。小国向大国，弱国向强国行赠贖之礼。杨国、梁国均为始建不久的小国、弱国，向晋国、虢国这样的大国、强国行赠贖之礼。她们是诸侯国之间，夫人与夫人的礼尚往来。晋侯墓地 M63 出土的杨姑壶和虢季夫人墓出土的梁姬罐，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杨国、梁国均为两周之际周王新肇建的国家。梁姬、杨姑同处于一个时代，又都是国君的夫人，而她们自作的青铜礼器却葬在与之相邻晋侯夫人、虢季夫人墓中，这种现象绝不是巧合。

獫狁未必都活动于陕甘一带，不必凡见戎、獫狁，必引陕甘之为说。其实，晋南地区对周人构成威胁的主要来自獫狁或戎。

1995 年洪洞永凝堡杨国墓地出土“尚父”簋，对我们讨论四十二年逯鼎“长父侯于杨”和多友鼎中“杨冢”以及两次周伐獫狁战事所在地域，提供有力的证据。

杨姑壶的制作年代当在晋侯墓地 M63 墓主下葬之前，尚父封杨（宣王四十二年）之后，与洪洞永凝堡杨国墓地出土的尚父簋同属宣王晚年一幽王时期。因此，杨姑壶属二次封杨的产物，它不能证明前杨国是姞姓。杨姑是杨侯的夫人，她来自姞姓国^[26]。而这个杨侯有可能是二次封杨之“尚父”。

前杨国之灭为獫狁（戎）所为，而后杨国的重新建立，是周伐獫狁取得胜利之产物。前杨之灭与后杨重建，其间隔年代会太长。因此，二次封杨并没有重新选址，重建新城池，仍然沿用前杨国之城池。前、后杨国使用同一个墓地，那就是永凝堡一坊堆墓地。杨国墓面积很大，延续年代无缺环，从西周早期延用到春秋早期。前杨、后杨丧葬习俗相同，墓向均为南北向^[27]。我们始终找不到理由相信其前杨国为姞姓，而后杨国却为姬姓之说^[28]。其实，洪洞永凝堡一坊堆墓地文化遗存与前杨国、后杨国都是兼容的。有人不深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有学者指出“长父受封之杨所在的地望到底为何处，四十二年逯鼎中的杨国是否就是古籍

中记载的杨国，还有待商榷。”^[29]

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窖藏四十二年逯鼎有：“余肇建长父侯于杨。”由此印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杨氏出于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而洪洞县永凝堡杨国墓地 M2 又出土“尚父”簋，器主尚父当为周宣王之子。因此，“长父受封之杨”，此杨国的所在地就有结论了。我们说杨国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霍山南面的范村、安东村、张村、敬村之间。

陕西眉县杨家村当是单氏家族在宗周故地的封地，属单氏家族世居之处。陕西眉县那个杨家村与杨国所封地无缘。杨姑不是晋侯墓地 M63 墓主，杨姑是杨侯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捷足先登先入为主的成见影响着考古界和史学界不少人，而我们有些同志却不加思考地附和。

[1] [3] 彭裕商. 周伐獫狁及相关问题 [J]. 历史研究, 2004 (3).

[2] [4] [19] [29] 田率. 四十二年逯鼎与周伐獫狁问题 [J]. 中原文物, 2010 (1).

[5] [7] 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 三晋考古. 第一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6] 参见董珊, 陈剑. 郾王职壶铭文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三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董珊推论: 多友鼎、四十二年逯鼎所述周伐獫狁的地域在晋南地区。(1995 年, 洪洞县永凝堡杨国墓地被盗, 县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永凝堡墓地作善后发掘清理, M2 出土“尚父”簋, 资料未能及时发表。笔者 2009 年才知道有此事, 估计董珊也不知道。如今发表“尚父”簋材料, 董珊之推论有望得到证实。)

[8] 陶正刚. 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 山西境内东周古城址调查. 1985.

[9] [10] 临汾地区文化局. 三晋考古. 第一辑. 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发掘报告.

[11]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 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 [J]. 文物, 1987 (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古遗址墓群清理简报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4).

1954 年发掘洪洞坊堆村十八座西周时期土坑竖穴墓, 有曲肢葬、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墓葬呈东西向, 墓主头向东, 与外来的周人不同, 属本地区非姬姓原住民。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古遗址墓群清理简报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4).

(下转 44 页)

2006: 113, 89, 101.

- [45] 裘锡圭. 古文字论集 [M]. 中华书局, 1992: 115.
- [46] 孙广明. “由、迪、克”字卜辞分析. 简帛研究网 <http://www.jianbo.org/>; 再谈甲骨文“比”字. 简帛研究网 <http://www.jianbo.org/>, 2010. 1. 13.
- [47] 孙广明. 《释“丙、商、伤、刻”字》, 简帛研究

网 <http://www.jianbo.org/>, 2010. 3. 5.

- [48] 姚萱.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 [D].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5: 101. 《花东》409 “𠄎吕多子于妇好”。
- [49] 孙广明. 周公庙遗址甲骨文考释 [J]. 历史研究, 待刊.

(责任编辑: 曹汉刚)

(上接 32 页)

-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 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J]. 文物, 1994 (8).
- [13] [14] [25] 李学勤. 晋侯邦父与杨姑 [N]. 中国文物报, 1994-5-29. 王光尧. 从新出土之杨姑壶看杨国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5 (2): 82-85. 李伯谦. 也谈杨姑壶铭文的释读 [J]. 文物, 1998 (2): 31-34. 冯时. 略论晋侯邦父及其名、字问题 [J]. 文物, 1998 (5). 陈昌远, 王琳. 从“杨姑壶”谈古杨国问题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1). 张德光. 亦从杨姑壶铭试探杨国的变化 [M].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第3辑.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296.
- [15] 王人聪. 杨姑壶铭与北赵 63 号墓主问题 [J]. 文物, 1996 (5). 孙庆伟. 试论杨国与杨姑 [J]. 考古与文物, 1997 (5).
- [16] [17] [21] 李建生. “梁姬”、“杨姑”相关问题 [J]. 中国历史文物, 2009 (3).
- [18] 吉琨璋. 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 [J]. 文物, 2006 (8): 48.
- [20] [28] 张天恩. 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 [J]. 考古与文物, 2010 (1).
- [22] 姜涛. 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 [M]. 文物出版社, 1999: 251、313.
- [23] 《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313 页 “我们将 M2012 时代定在西周晚期晚段, 即宣、幽时期应大致不误。又 M2012 及其附葬之车马坑均被 M2001CHMKI 所打破, 故其入葬年代应早于虢季墓 (M2001)”。
- [24] 姜涛. 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精粹 [M]. 众志美术出版社, 2002: 11~32.
- [26] 1993 年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64 号墓出土有“晋叔家父”盘、“晋侯邦父”鼎、“叔钊父”甗。“晋叔家父”、“叔钊父”与“晋侯邦父”同出于晋穆侯墓中, 他们可能是一父所生的同辈兄弟。其中“叔钊父乍柏姑宝甗”, “叔钊父”称其妻为

“柏姑”, 属国姓前冠女子本国国名。如“齐姜”、“梁嬴”、“鲁姬”。由此铭知“柏”为姑姓国。柏国为西周时的封国, 在河南南部, 春秋犹存。姬姓晋国与姑姓柏国通婚, 杨国也有可能与姑姓柏国通婚, 杨姑可能来自柏国。

传世鬲有铭文 “穆公作尹姑宗室于繇林” (《集成》3.754), 由此铭知尹人国族姓为姑姓。陈梦家先生认为“尹姑”是穆公之妻。

传世鄂侯簋 “鄂侯作王姑媵簋, 王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 (《三代》7.45.3-5)。鄂侯嫁女于周王媵器, 鄂侯称其女为王姑, 由此铭知鄂国为姑姓。西周中晚期鄂侯率淮夷反周, 夷王令西六师、殷八师伐鄂, 鄂亡。“杨姑”壶制作年代比夷王要晚, “杨姑”不会来自鄂国。

- [27] 若前杨国为姑姓, 后杨国为姬姓。姑姓国与姬姓国丧葬习俗、墓葬的朝向有可能不同。

两周时期, 姬姓高级贵族墓葬, 墓的朝向都是南北向的。如: 陕西韩城芮公夫妇墓、天马一曲村晋国贵族墓、安徽寿县蔡侯墓、河南平顶山应国墓、陕西岐山周公庙贵族墓、河北邢台邢国贵族墓、北京琉璃河燕国贵族墓、河南新郑郑国贵族墓、陕西张家坡井叔墓、三门峡虢国贵族墓、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夫妇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万荣庙前吕宣子魏相东周墓地、新郑许岗韩王陵, 凡能确定为姬姓贵族的墓葬, 都是南北向的。

两周时期, 非姬姓高级贵族, 墓葬的朝向均为东西向。如: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陕西临潼秦王陵、绛县横水虢国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琉璃阁范氏大墓、太原赵卿墓、邯郸赵王陵、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浙川下寺一号楚墓、枣阳九连墩等楚墓。其中, 秦为嬴姓, 虢为赤狄媿姓, 范氏为祁姓, 赵卿为嬴姓, 楚为半姓。黄国是周代嬴姓小国, 故城就在潢川县西北, 至今古城尚存, 信阳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的朝向是东西向的。樊国为一嬴姓诸侯小国, 信阳平桥南山嘴樊君夫妇墓亦为东西向的。

(责任编辑: 向 祎、曹汉刚)